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牘五种

金兆蕃 叶景葵 蒋抑卮等 著

丁小明 柳和城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

金兆蕃 叶景葵 蒋抑卮等 著

丁小明 柳和城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彭国忠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 / 丁小明, 柳和城整理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9.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六辑)
ISBN 978-7-5506-2955-4

I. ①新… II. ①丁… ②柳…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近现代 IV. ①J29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2385号

书 名	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
整 理 者	丁小明 柳和城
责 任 编 辑	李相东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955-4
定 价	5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7572508)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罕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罕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罕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罕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裛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是册收录整理者近年来所见的尺牍五种,分别是《晚清驻朝鲜使臣致朝鲜大臣金昌熙尺牍》《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叶景葵致盛宣怀尺牍》《蒋抑卮致叶景葵、徐新六尺牍》《叶景葵友朋往来尺牍》。现将五种尺牍的相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

“晚清驻朝鲜使臣袁世凯等人致朝鲜大臣金昌熙尺牍及文稿”所公布的有袁世凯、张謇、朱铭盘、林葵、吴朝彦、周家禄、李延祐、沈朝宗、邱心坦、郭春华、方正祥、张光前等人致金昌熙(石菱)信札、诗稿、文稿、笔谈实录、名刺等各类文档约一百件。具体言之,袁世凯致金昌熙信札十通、《谭屑》序、跋原稿各一篇、名刺一页;张謇致金昌熙信札十六通、《谭屑》序原稿一篇、名刺一页,其他跋文一篇;朱铭盘致金昌熙信札十一通、《谭屑》序原稿一篇、《谭屑》题耑原稿一则、名刺一页;吴朝彦致金昌熙信札五通、《谭屑》序一篇、名刺一页;周家禄致金昌熙十二通、致朝鲜国王书一篇、名刺一页;李延祐致金昌熙信札十九通、《谭屑》序一篇、诗稿三开、名刺一页;林葵致金昌熙信札两通、《谭屑》序一篇;王锡鬯致金昌熙信札五通;吴鸣銓致金昌熙信札两通、《谭屑》序言一篇;潘钟杰致金昌熙信札四通、文一则;张察《谭屑》序原稿一篇;邱心坦《谭屑》题诗原稿一篇;纪堪沛《谭屑》题诗原稿一篇;谭赓尧致金昌熙信札一通、《谭屑》序原稿一篇;另有方正祥、吴兆有、郭春华、刘绍棠、沈朝宗、黄仕林等“庆军”驻朝将领致金昌熙的信

札与众人赠与金氏的名刺及部分将领与金氏笔谈的实录。

本批丛札与文稿的上款人金昌熙是晚清时期朝鲜政坛与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金昌熙(1840—1890),字寿敬,号石菱,韩国月城人,历官李朝史部侍郎、国子监祭酒等职,有《石菱集》《谭屑》等著作行世。金昌熙与晚清驻朝“庆军”诸将领渊源甚深,朝鲜“壬午兵变”时,“庆军”东渡入朝,金昌熙就是李朝的迎接官,其间他与袁世凯等人交往甚多,并著有《东朝迎接录》详记这段波起云涌的岁月。“庆军”入朝后,金昌熙以“少宰”的身份负责李朝与清驻朝“庆军”诸大臣之间的交通,特别是作为袁世凯编朝鲜亲军的后勤军需助手,亲历了“壬午兵变”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同时,作为一位精通汉诗文的李朝士人,金昌熙与“庆军”诸将领在交往的过程中,留下大量私人文墨交往的档案。由于保存有方,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批档案中的绝大数笔札与文稿始得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内容而言,汇集数十位晚清驻朝名臣致金昌熙丛札及文稿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晚清名臣袁世凯等人致金昌熙的系列信札;二是袁世凯等人为金昌熙《谭屑》一书所作的序文与跋文;三是驻朝大臣与金昌熙笔谈原件及他们赠与金氏的名刺。这三部分内容中既有与中朝关系、朝鲜军政有关的资讯报告与讨论,如袁世凯练兵的诸多细节,周家禄致朝鲜国王书,潘钟瑞关于钱贱物贵的讨论,以及笔谈实录中涉及的中朝政局等等。也有中朝士人友情通连谊的个人交往,如金昌熙刻《谭屑》一书索序于驻朝使臣,驻朝使臣往贺金昌熙的儿子合卺之喜以及彼此之间的诗词唱和等等。

“晚清驻朝鲜使臣袁世凯等人致朝鲜大臣金昌熙尺牋及文稿”这一重要历史档案的公布不仅为我们揭密了袁氏早年驻朝的政坛往事,更透露了十九世纪末风云际会的东亚时局中的一些隐秘细节。可以说,“晚清驻朝鲜使臣袁世凯等人致朝鲜大臣金昌熙尺牋及文稿”不仅是袁世凯研究资料的新发现,也是对中国晚清驻朝鲜使臣团及与之有关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还原和挖掘,更为近代东亚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大宗资料。

二

金兆蕃致曹秉章信札，凡一百六十九通，这批信札主要关涉金、曹二人为编撰《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二书而往来讨论的诸多细节，对我们还原与研究民国学术史上的这两件学术盛举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金兆蕃(1869—1951)，原名义襄，字钱孙，号药梦老人，秀水(今嘉兴)人。清末移居平湖县。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任内阁中书，后膺清廷经济特科之选，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1915年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次年改署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并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等。1919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修清史，参与纂修。1923年始参与《晚晴簃诗汇》编纂，1928年参与编修《清儒学案》，著有《安乐乡人诗》6卷、《药梦词》4卷。

曹秉章(1864—1937)，字理斋、玉砚，号玉研老人。浙江嘉善人。民国间曾任国务院印铸局局长。民初史志专家。徐世昌门人，徐氏应酬之文多出其手，又担当徐世昌所主编《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两书的主要助手，两书编纂时的具体人事的协调与统筹皆由曹氏总务，可谓事巨而任重，而这些具体的细节均可以见之于金兆蕃与他的这批通信之中，尤此也可见这批信札的内在学术价值。

三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别署存晦居士，浙江杭州人。近代著名银行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叶考中癸卯科进士，在清末重臣赵尔巽幕中长期担任财政经济部门职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定居上海。次年应邀兼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理。叶在沪期间与盛宣怀开始交往，留下一批信札与呈文。

1908年3月盛宣怀受光绪、慈禧召见，博询时局要政，旋奉旨飭令赴邮传部任右侍郎本位，兼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庚戌十二月（1911年1月），叶景葵由盛宣怀推荐被清政府任命为度支部天津造币厂总监督。上任伊始，他向盛宣怀报告该厂“账略”，又呈送铸币计划，以及通报购买锅炉、调查厂内存铜、主辅币祖模刻铸、化验生考试等事。显然造币厂以及后来的大清银行均属盛宣怀管辖范围，因而叶都向他报告。叶氏筹划之周密，办事之干练，很快引起上司们的注意。

同年4月，度支部具禀奏请调任叶景葵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大清银行正监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除经营库存接济、存放款项、汇兑划拨、代客收存财物等一般银行业务外，还赋予铸造货币、发行钞票、代理部库等特权。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厘定《大清银行则例》，进一步确定该行国家银行的性质。资本增至一千万两，分为十万股，国家认股五万股，其余限定本国人承买，俗称商股。但是该行长期在监督张允言把持下，朋比为奸，内外勾结，贪污盗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清政府为挽救危局，派叶景葵前去整顿，但又保留张允言帮办的职务，叶氏面临的处境可以想见。5月初叶景葵尚未到京履职，盛京（今长春）大清银行吉林分行发生大火。当时恰逢清内阁改组，成立“皇族内阁”，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大臣，帮办度支部币制事似乎仍然兼任着。度支部派遣叶景葵赴盛京调查火灾原因及损失，同时调查东三省市制事。1911年6月29日（六月初四）叶氏上盛宣怀禀文，真实地反映了清末东三省混乱的金融情形，也显示出作者治理乱象的勇气与决心。同时又不急于求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而进，在当时的官员中，如此具备专业知识，又有改革胆略者能有几人？7月叶氏致盛的几通信札，有密报外媒对盛氏经营的汉冶萍公司借款的看法，有对“皇族内阁”的评论，有报告铜官山借款清理之事，等等，多方位地反映了二人的密切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辛亥年盛宣怀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在《盛宣怀年谱长编》中不知什么原因反映极少，这批叶氏信札与呈文，恰可填补其空白。

这里刊出的二十通叶景葵致盛宣怀的信札与呈文,有两个来源。其一,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简称“盛档”),有一通选自已刊《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其二,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牒初编》与《近代名人手札精选》(香港中文大学 1988 年、1992 年版)。后者系盛氏后人带至香港的一批档案史料,与上图保存的“盛档”正好互相补充。

四

上海图书馆藏原叶景葵(揆初)先生卷盒藏书中,有三册《蒋抑卮先生手札》原件。收录 1929 年至 1930 年蒋氏作为浙兴办事董事兼汉口分行经理期间,写给董事长叶景葵与总经理徐新六(振飞)的私信。所谈大部分为银行公事,作者都编有顺序号,可补上海市档案馆浙兴档案之阙如。

蒋抑卮(1875—1940),名鸿林,浙江杭县人。民国著名银行家。早年从章太炎学习文字训诂。游学日本,与鲁迅同学。返国后投身实业,参与发起浙江铁路公司与浙江兴业银行,长期担任董事。这批书札的来历,叶景葵 1940 年 12 月在蒋抑卮逝世追悼会致辞中有详尽介绍:“民国十六年,国民军北伐下武汉,颁现金集中令,商市震动。汉行经理史晋生先生辛苦支拄,体力不胜,乃萌辞意。总办事处遂推抑卮先生以办事董事兼理汉行。先生于十八年四月初赴汉视事。而于莅汉一百零六天内(四月十四起七月二日止),除每日公务号信之外,复亲笔致函景葵五十六通,详叙号信所不能包括之公务及进行业务之计划,或应守秘密之事件。七月初东返,九月初回汉,又于七十九日内(九月十九起十二月八日止)亲笔来函四十九通。十八年底东返请辞兼职,景葵以汉行事务尚待整顿,复请先生回汉。十九年三月初又到汉,于四十二天之中,又亲笔来函二十六通。统计在任一年,亲笔重要报告达一百三十一通之多!”《手札》原件部分缺失,而有数

通正可与1946至1947年间叶发表于《兴业邮乘》复第6期至第10期《及之录》内《蒋抑卮先生遗书》对上号,显然系当年刊用所需而抽出。另外,有两通信函录自上海市档案馆浙江兴业银行档案,现一并作为《手札》整理如下,希望有助于浙江兴业银行史以及蒋、叶二人生平之研究。对于了解南京政府成立后当局向各银行摊派、勒索,当时工商业的艰难处境以及各家银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无疑也是难得的史料。其中“一厂”(即汉口第一纱厂)十分典型,又是贯穿这批信札始终的重要内容,略作介绍。

该厂1914年由湖北人李紫云集资白银210余万两创办。其机器设备由英商安利英洋行提供,时值“一战”期间,洋行藉口无法运输,一拖再拖,后来勉强开工,又因军阀战争、工潮迭起等因素,几经周折。至1928年春,全厂停工,9000多工人生计无着,劳资双方冲突不断。浙江兴业银行曾与安利英洋行、沙逊洋行共同借款233万两予该厂,成为该厂第一债权人。此外,该厂又欠浙江兴业银行花纱押款60余万元,以及到期利息、代垫保险费、工资等共70余万元,均未偿还。当时浙兴总资本仅250万元,清理一厂债款关系重大。1927年该厂董事长李紫云因忧愤交加,精神失常,投井而亡,由毛树棠继任董事长。继而一厂又成立新董事会(董事长周星棠,代理董事长彭少田),各行其是,互相推诿,宣称不承认老董事会借款合同。原按借款合同规定,即应没收标卖。洋商方面明确提出没收标卖,连广告都已草拟完成。事关浙兴大局,加上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各行其道,矛盾重重,局势扑朔迷离。为此,叶景葵于1928年8月携蒋抑卮赴汉口处理此项债权债务纠纷。经债权人、当地政府与厂方多次磋商,达成协议,成立维持委员会恢复生产,省政府也允诺烟囡冒烟即投入资金。但由于维持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至1929年2月阴历年末矛盾加剧,再一次发生停工事件。浙兴作为第二债权人,不能坐视该厂再起风波。时汉行经理史晋生因病告假,3月1日总经理徐新六受董事会委托抵汉,会同各方处理此事。徐与

安利洋行定下共同接办一厂的框架协议，即业务归安利主持，会计由浙兴负责。徐新六因需掌管全面，不能长期滞留汉口，于是叶景葵请蒋抑卮坐镇汉行，除处理汉行日常事务外，安排一厂会计、与洋商及一厂各派别董事交涉，也成为蒋的日常重要工作。

信札涉及当时的金融术语极多，大都已是“明日黄花”，成为历史陈迹。笔者整理中查阅了相关史料，才有一些了解，如规元行市即为一例。规元，又称豆规银、九八规元，只是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并非实银。鸦片战争前，豆类属于上海出口大宗商品，交易即用“规元”计算，故有“豆规银”之称。又因与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比值折算率关系，故又称“九八规元”。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以前，银元和银两都是流通的主要货币。银元即现洋，包括大清银圆、民国银圆（即“袁大头”），甚至还有墨西哥鹰洋等外国银币。由于商品的交易、债务的支付、税捐的征收，都会碰到因银两货币的混乱和不稳而产生的麻烦，银元与银两之间又不能互相抵用，常常出现“银元押款”的怪现象，即商人拿银元作抵押去借银两。而银元与银两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兑换比例，于是“买洋、装洋”看行市，就成为银行家必须掌握的本领。今天的人们是很难理解叶景葵、蒋抑卮他们的苦衷的。

蒋抑卮在汉口完成与一厂签订还款副约后不久回沪，然而浙兴所背包袱并未卸下，与一厂的交涉又持续了十余年。据史料记载，1931年湖北大水，汉口第一纺织厂被淹，停工二十余天，损失惨重，所欠债务根本无法偿还。1933年董事会改组，推定银行业资本家周星棠为董事长，经营仍无起色，至1935年亏损400万元，1935年底该厂第三次停工。资料显示，该厂自1921年至1935年，累计亏损达2000万元之巨！接着抗战爆发，工厂被日本人占领，那位汉口安利英洋行经理马克当了“英奸”，打着太阳旗领头“欢迎”皇军入厂。直到抗战胜利，该厂才被国人收回。对于战前所欠安利洋行与浙江兴业银行巨额债务，一厂当然无法偿还，又拖了几年。现存1947年1月下旬，叶景葵复时任浙兴汉行经理徐维荣函，告以汉口第一纱厂人

员来访情况,建议“我方只有抓住复工委员会紧紧不放”,以求早日取回现款为上策。函云:“李、程来舍见访,弟未与之谈及一厂事,以后邀饭,亦辞而未赴。其与沙逊面谈情形,据(项)叔翔(时任浙兴总经理)转述,沃君措辞极有分寸,惟程子菊则借此夸耀,以见好于董会。现在沙逊有函电致兄与董事会,当可恍然矣!沃君因急思了结,故内心不免有妥协之意。其实弟何尝不然?如果七十七万镑有支票送来,何尝不见钱眼开?因为彼方绝办不到,故以高唱入云为手段。据弟揣测,李与程均不愿复工委员会结束,趁此机会开股东会,董事到手依然可做委员长,可做总经理,宋立峰依然可做经理。所以股东会一过,彼方未必着急,依然是个拖局。然则我方只有抓住复工委员会紧紧不放,与之扭结到底,结果总是捞进。欲求迅速彻底解决,难乎其难!兄谓如何?李与程显然不和,我方以联李为要着。沙逊则时时与之接洽,贡献意见。沃君必不致单独武断,可请放心。”此信证明那时一厂董事会急于了结债务,浙兴有意“以退为进”,利用其内部矛盾“扭结到底”。然而事情也不顺利。1947年2月,一厂股东会讨论红利分配,安利与浙兴也要求享受40%红利被拒绝,浙兴汉行经理徐维荣在股东会遭围攻,最后闹到汉口地方法院。经过法院调解,1948年7月双方达成妥协,一厂用1400包20支红狮球牌棉纱了清二十余年所欠安利与浙兴债务(包括1946、1947年红利)。根据当时纱价,这1400包棉纱约值银币30多万元,剔除几十年来物价变化因素,浙兴仅收回当年债款十分之一!蒋抑卮于1940年已去世,也没能等到这一天。

这批信件按照作者三次在汉任职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929年4月14日至7月2日;第二部分,1929年9月19日至1929年12月8日;第三部分,1930年3月14日至1930年4月5日。原信标有“第一号”“第二号”等顺序记,现改为一、二、三……等,阙札保留编号。少量信札录自印刷件,略加注释,以示出处。有些信上原有批注,也予以注释说明。

五

叶景葵是著名藏书家，其卷盒藏书以丰富的钞、校、稿本著称于世。抗战中他捐献出全部藏书与各种历史文献，与张元济、陈陶遗等发起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1953年6月，“合众”更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

这里辑集的共三批叶景葵亲友往来书札：一、《尺素选存》；二、《叶揆初伉俪亲友手札》；三、叶景葵致朱遂翔信札。前两种均为叶氏生前所藏并整理，今藏上海图书馆，写信人绝大部分为近现代名人，内容也几乎为银行事务之外的藏书和文化学术活动，对于研究收信人生平及其事业，当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尺素选存》中涉及《谐声谱》印行问题的信函占有不小比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部书刊印过程及其影响。《叶揆初伉俪亲友手札》内多封赵尔萃来信，揭示了叶氏与赵尔巽兄弟的渊源关系。现将同一人的来信合并排列在一起，以便阅读。近年拍卖市场披露的《抱经堂历年所藏名人信札》，为民国时期杭州著名书铺抱经堂主人朱遂翔所藏信札，其中叶景葵的信札有九通，均为购书事。抱经堂创办于1917年，信誉卓著，又印行书目，实行函购，首创古旧书籍明码标价之例。叶景葵与其交往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钞稿本《读史方輿纪要》即购自抱经堂。叶还应邀为朱遂翔的《抱经堂藏书图》题跋。此九通书札约撰于1930年代初。

丁小明 柳和城

己亥春正识于沪上寓所

凡 例

一、本书收录《晚清驻朝鲜使臣致朝鲜大臣金昌熙尺牍》《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叶景葵致盛宣怀尺牍》《蒋抑卮致叶景葵、徐新六尺牍》《叶景葵友朋往来尺牍》等五种近现代名贤尺牍。

二、本书所整理尺牍一般以原件为底本，少量尺牍录自印刷件，略加注释，以示出处。阙札保留编号。尺牍原有批注，也予以注释说明。

三、尺牍原有批注说明，包括夹注、旁注者，用小号字体表示，并独立标点。尺牍原有非手写信息，需要加以说明者，用括号说明。

四、本书为横排简体。异体字一般径改之，但以不碍文义为准。影响文义者，则予保留。

五、原件湮漫不清或以难以辨识之字，用“□”表示。

六、本书所整理尺牍的排列顺序一仍其旧，整理者不作重新排列。